[英国] 以赛亚·伯林

伯林书信集

卷二　启蒙岁月：1946—1960

译林出版社

伯林书信集

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卷二

启蒙岁月：1946—1960（下）

[英国] 以赛亚·伯林 ____ 著
亨利·哈代　詹妮弗·霍姆斯 ____ 编
陈小慰　叶长缨　张慧仁　余梅娴 ____ 译
陈小慰 ____ 统校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林书信集（卷二），启蒙岁月：1946—1960/（英）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著；（英）亨利·哈代（Henry Hardy），（英）詹妮弗·霍姆斯（Jennifer Holmes）编；陈小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4

（伯林文集）

书名原文：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ISBN 978-7-5447-7504-5

I. ①伯… II. ①以… ②亨… ③詹… ④陈… III. ①伯林（Berlin, Isaiah 1909—1997）—书信集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6188 号

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by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Jennifer Holm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erena Moore
Letters from Isaiah Berlin © the trustees of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09
Letters from T. S. Eliot © Set Copyrights Limited 2009
Quotations from other letters © their several authors or their heirs and assigns 2009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and Jennifer Holmes 200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96号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saiah Berlin visit https://isaiah-berlin.wolfson.ox.ac.uk/

伯林书信集（卷二），启蒙岁月：1946—1960　［英国］以赛亚·伯林／著　陈小慰等／译

责任编辑　陈　锐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Chatto & Windus, 200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9.125
插　　页　8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04-5
定　　价　18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1953—1955：全灵学院

很显然，一切都将不同了[1]。 413

[1] 致塞姆·伯尔曼，1953 年 12 月 26 日。

伯林飞回英国，12 月 13 日星期天一早到达，与父亲在医院度过了“愉快的两天”[1]。他们讨论了纳菲尔德的邀请，门德尔·伯林对此态度坚决：“不行，不行，不行，无论如何都不要接受，它根本不适合你。”[2]“星期一晚 9 点”，他们最后一次“像以往一样平静地分别”。

致罗兰·博登—穆勒

1953 年 12 月 15 日［电报］

伦敦

父亲今天安详去世　以赛亚

门德尔去世之后的一周，是犹太传统的哀悼期。然后伯林开始尝试接受他已经改变了的人生景观。

致威廉与艾丽丝·詹姆斯

1953 年 12 月 23 日［邮戳日期 1954 年 1 月 1 日，手写明信片］

全灵学院

亲爱的比利与艾丽丝：

非常感谢你们的电报与比利的来信。我星期天早上到

[1] 致安娜·卡琳，1954 年 1 月 13 日。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二十八。

达，父亲不仅神志清醒，而且思维敏捷，不觉得痛苦：他不知道他的病是致命的，但知道自己病得厉害——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对离开人世的理解就像孩子对圣诞老人的理解：他也信也不信，来回摇摆。我和他度过了美好的两天，他星期二清晨在睡梦中去世，15 号。虽然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了，但这并没有因此减轻我的悲痛。你们说得非常非常对，我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自从我记事起就在那儿存在着的根，没有了。太多的爱，亲密，奉献，我想，总得偿还。此刻我没有感觉，没有什么事情令我有反应，我四处奔波，处理经济事务，照顾母亲，等等。幸好我还有日常机械的事务要处理。[1] 摆在眼前的未来还不确定，也许我春天会和母亲一起回去，或者不带上她，或者不回：这取决于许多因素，我要到新年才考虑它们。同时我想说你们的爱对我来说多么重要——无论在哪里，无论怎样。我想我会好起来的，人们都是这样。现在他的字迹是最困扰我的东西，但这会过去的。

致以我深深的问候

以赛亚

[1] 他在伯林致塞姆·伯尔曼的信中写道："我的父亲突然去世（医生都没有想到），他们告诉我，他是安详地离开的，时间是 15 日早晨六点。我母亲已经尽可能接受了这件事；葬礼非常隆重，朋友们都感人地聚在一起。我的感觉很奇怪：毫无知觉，似乎什么也不在意，如果明天宣战了，我也不会有强烈反应；无疑当我全面恢复知觉时，情况会更糟。很显然，一切都将不同了。"1953 年 12 月 26 日。

致伦纳德·伍尔夫

1953年12月29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伍尔夫先生：

非常感谢你关于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所发的小文章[1]所说的话语。我确切记得曾经在战前去您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房子——或者就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并且，在我已经在美国为政府服务的时候，又再次收到您的邀请——我当时当然非常高兴得到这个拜访机会——虽然在我看来这还远远不足以对天才的伍尔夫夫人表示敬意。我一共见过她三次[2]，那是我此生其他任何体验所无法比拟的——我认为她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美丽、最圣洁的人，如今依然这么认为。然而，当然，我从来就没有与她认识，然而这些见面实际上永远改变了我对事物与人的想法。相信有许多人也这么认为，这样的告白您也许已经听得太多。

谢谢您对我混乱无章的文字所作的慷慨评价——非常感

[1] 伯林所发文章“年度图书”是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家日记》，《星期日泰晤士报》1953年12月20日第6版。

[2] 也许四次：伯林多次提及1933年在新学院的晚宴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遇[《伯林书信集》（卷一），原文第68—71页]，1934年在伊丽莎白·鲍恩的宅邸[《伯林书信集》（卷一），原文第85页]，在伍尔夫的家，还有在本·尼科尔森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公寓（后两次也许是在1938年；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九）。

谢您寄来的新作，我会很有兴趣阅读，我想您对自由与奴役的看法一定与我极为相通——您所写的一切都是如此。如果您来伦敦，能与您见面是我莫大的荣幸与机遇。我时时会在这里，直到一月底，到时候我或是去牛津，或是再次去美国待上两三个月——我父亲两周前去世，因此产生的诸多责任让我留在这里。请您保重，不要过于操劳。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莫顿·怀特

1954 年 1 月 5 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莫顿：

我没有太早离开，因为在我到达两天之后，父亲在睡梦中安详去世。我不会跟你详述细节——这太可怕了，由于我的家人之间关系特别紧密，父亲去世的影响无法估量。此时我所能做的就是照顾母亲，做生意上的安排，处理父亲的产业，这些目前还不会立即毁了我们的一切。我发现自己成了公司经理，但是既不理解其业务，也对自己的资产没有把握，而且对此很难预测。只要是遗嘱验证以及相似的细节要执行，我就不能真正离开，也不能让母亲独自一人。无疑，我可以劝她去耶路撒冷与她的姐妹在一起，但我觉得目前最好和她在一起，因为没有别的孩子了（我是说没有别的亲

戚，而非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们）。

我也还没有决定纳菲尔德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它依然对我有诱惑，但是我此时所有的想法都抗拒它，理由是：(1) 它会占用我太多的时间，让我根本没有办法写书；(2) 他们所关注的中心是半实践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这对我而言太遥远，我对此也不太有共鸣，强迫他们脱离他们的正当目标，违背他们虔诚的创立者以及最初创办学院的人们的初衷，虽然我内心想要这么做，实际上他们也希望如此，但这需要一个远比我所可能成为的要强硬得多、更有精力、对管理与指导这样一个机构更有热忱的人。我认为自己脸皮薄，受不了批评；如果我是那样的人，也许我就不该管任何人，除了通常麻烦的繁文缛节和行政事务之外，这些我倒是不介意，私底下还蛮喜欢。所以也许我最好等待牛津的教授职位，虽然我极有可能得不到它，[1] 因为选举委员会非常古怪。[……]

我真的无法对纳菲尔德下决心，我在等待某种突如其来的神秘念头与感觉，这样，在某个美好的早晨，我会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出决定——人们告诉我如此神秘而非理性的过程会发生，根据我近期出版的小册子的评论者们所
417 说，我实际上就站在这些黑暗力量一边，也许我应该相信他

[1] 然而，伯林悄悄告诉父母，G. D. H. 科尔已经“实质上对他承诺了”（1953 年 11 月 30 日）。

们。此时我还在与支持纳菲尔德、反对纳菲尔德，以及其他所有人心烦意乱地谈判，其间赶到伦敦城打理看不懂的会计账目。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否还会回到以前习惯的轨道上。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我从被人照顾提升到了照顾者的身份，有点不喜欢这样的转变。

向露西娅致以我的问候，快点给我写信吧。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梅耶·夏皮罗

1953 年 1 月 5 日［应为 1954 年］

全灵学院

亲爱的梅耶：

［……］现在，关于“狐狸”等，我希望你是对的。我想我的确夸大了托尔斯泰与迈斯特的成就。我认为他们都非常尖锐，比你所想的更为尖锐，但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细致认真。你是对的，如果你发现我有种过度炫耀冰冷、尖锐、强硬特质的趋势，反对模糊的理想主义、共同的情感与讨喜，因为我对后者的憎恨甚至超过了对知识或是道德邪恶的憎恨，认为它们毁掉标准也压抑争议——相比之下，耶稣会士还要好些，它们坚持罪恶的观点，但至少让他们的武器保持锃亮，让话题值得争论，也不会偏离知识标准，好过那些更柔和的妥协者，他们让整个事业陷入沼泽，淹没一

切，使人无法说话，无法思考。在细节上，托尔斯泰的讽刺与德·迈斯特非常相似，射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箭，将其无法用经验观察或理性论证支撑的希望与乐观主义轻蔑扫除，宣告非理性信仰。你认为德·迈斯特不相信伟人，我觉得不是这样，他的确相信中世纪的伟人，也相信摩西与教会创始人，等等。在这方面他与托尔斯泰无太大差别——无疑存在着有机法则，它们是他们的表达，与黑格尔的论述方式不同。我不相信的是德·迈斯特的理性主义。他当然论
418 及了“科学”，但是在他而言科学就是圣托马斯[1]所教授的“科学”，他把圣托马斯与牛顿[2]相提并论（如果我没有记错[3]），并说圣托马斯之于牛顿，就好比是山鹰之于蒙戈尔费埃的热气球[4]。虽然他公开引用了圣托马斯与亚里士多德的话，但在我看来这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他实际上是奥古斯丁派[5]——并不那么相信理性神学，就像不相信神秘的灵感、圣灵、《旧约》中的英雄、鲜血，等等，当他说到可以

[1] 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托钵修会修士、烦琐哲学家、神学家。

[2] 艾萨克·牛顿爵士（1642—1727），数学家、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经常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

[3] 伯林记错了。当谈论亚洲品位更喜爱奇迹而非科学时，迈斯特认为“原始的科学”是“直觉的时代。被束缚的山鹰要的是一个蒙戈尔费埃的热气球来把它送上天空吗？不，它只想挣脱它的锁链”。《圣彼得斯堡对话》（1821），第二对话：《迈斯特全集》（里昂 / 巴黎，1884—1887），iv，第 78—79 页。

[4] 蒙戈尔费埃兄弟，约瑟夫—米歇尔（1740—1810）和（雅克）—埃蒂安纳（1745—1799）：1783 年演示了他们的热气球。

[5] 指圣奥古斯丁·希波（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

应用到历史中的自然科学，这只是对那些抽象原理偏好者如法国理性主义者或是卢梭们的嘲讽而已。当然上帝向他显灵了，通过动物学而不是笛卡尔逻辑，但那是一个充满混乱与杀戮战场的世界，不是一个明了易懂的系统——他因而对培根猛烈攻击，还为培根写了一本书，你知道的[1]。当然，托尔斯泰本会反对迈斯特对法国革命的解释，但他自己对所发生事件的叙述与迈斯特对孔狄亚克的戏谑非常相似。[2] 这无须太当回事，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仿拟，但是很好地说明了他的意图。（“科学”、“物理学”等词汇的使用不该迷惑了人们：迈斯特向亚历山大一世建议[3]阻止科学，驱逐科学家，他们是颠覆性的政治傻瓜。在他看来，科学是神学 + 教会授权的任何一种第二事业，仅此而已。）托尔斯泰，在我看来，当然常有奇怪而错误的观点，但要看清它们错在哪里，他提出问题的真正答案是什么，却并非易事。所以，他在知识上的优越性就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呓语。你提到了米

[1]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圣艾尔班斯子爵，律师、政治家、散文家、自然哲学家，提出并发展了科学方法论；德·迈斯特著有《培根哲学研究》一书，在他死后于 1836 年出版。

[2] “迈斯特通过否定 18 世纪对语言起源的思考来获得莫大的快乐。他说，卢梭很困惑，不知道人类如何最早开始使用语言，但全知的孔狄亚克知道这个问题以及所有问题的答案：语言显然产生于劳动的分工。这样一代人说 BA，另一代人加上 BE；亚述人发明了主格，米堤亚人发明了所有格。”《扭曲的人性之材》，第 141 页，引自《迈斯特全集》，iv，第 88 页。

[3] “这个国家的伟大一步就是阻止科学的统治，把教会的权威当作主权的同盟，直到科学可以安全地渗透进社会之中。”《俄罗斯四章》（1811），《迈斯特全集》，viii，第 344 页。

什莱，你引用的他的话很有意思，我为此非常感激你，但托尔斯泰当然会反对它的，如你所说的那样，不仅因为它是对人们的浪漫描述，虽然程度更深，因为米什莱想要弄明白，人们（或是“人类”）永远都以英雄的方式来与自然斗争，把它的形式强加于盲目的必要性之上，为了真理、解放、人
419 的价值等而奋斗，我想所有这些观点来自德国人。托尔斯泰当然要对此提出反对，他认为英雄不是普罗米修斯——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但谦逊的圣贤不会让自己的理智意志与神秘进程相对立，而这在战争中或是在和平时期几乎就是神圣的，并且在后来公开成为基督教的信仰——但我想，他是以某种非计算、非分析的方式来理解它并认同它的。米什莱骄傲地反对无生命的自然，勇敢宣称人的价值、民主，爱国等（这更像是赫尔岑），在托尔斯泰看来依然是自由主义者的胡说，这表明了思维的谬误，人类或是人们的总体欲望，包括优于非个人进程——或是个人进程，如果你也把上帝包括在内——的是非标准，需要极其谦恭、一个领悟启示的时刻。托尔斯泰摇摆于直接反理性主义的观点与全知理性存在可以吸纳一切微小动机的假说之间，在这二者中他都反对的是英雄主义、意志——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的尖锐主张，这当然就是米什莱的核心理论。我也许还是夸大了，你也许是对的。不管怎样，我相信你有道理，虽然如你所看到的，我会反驳。我想真正会令你不快的是，你在我身上感受到的、揭穿应用于人类事务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热情，这一点

我承认。我的确认为社会学理论上说是不可行的，那是构建于错误类比之上的疯狂梦想。对此我打算写一篇文章，会在发表之前寄给你，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这方面你我会有真正的分歧，但是你对这个论题的看法比其他任何人的更令我珍视。我在史密斯学院的演讲用了这篇“文章”，我想没有人真正理解它，也不会喜欢它。让我什么时候把它寄给你吧。

3月你会在哪里？已经在欧洲了吗？请告知。

致以诚挚问候。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玛丽·费希尔[1]

1954年1月13日［手稿］

伦敦西南1区蓓尔美尔街革新俱乐部

寄自全灵学院，我已返回此处

亲爱的玛丽：

我确实知道父亲患上白血病：不可治疗的绝症。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治疗方法，只能听天由命。医生春天时发现的，4月告诉我母亲，她6月告诉我。你可以想象，从6月到9 420
月，我贿赂父亲那位不是很优秀的常规医生，让他告诉父亲

[1] 玛丽·利蒂希亚·萨默维尔·费希尔（1913—2005），赫伯特·阿尔伯特·劳伦斯与莱迪丝·费希尔的女儿，伯林长期的朋友；1955年与约翰·班纳特结婚，1945—1956年任职于英国殖民部，后（1965—1980）任圣希尔达学院院长。

他得了贫血——一个无害的词，症状相类——从而劝说他去专业医生那里治疗。专业医生（我很不喜欢——后来发现他是帕肯汉姆夫人[1]的打高尔夫球的弟弟）说，如果是慢性的，我父亲可以活几年。我本不想去美国，但认为这已经是几年前的安排，如果我不去，父亲会被吓坏的，现在我还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我痛苦地离开，心里既感到负罪又如释重负，因为不用面对被骗的父亲——两三个月里，他显然日渐衰弱。然后我收到母亲以她的“不用担心”的口吻发来的电报，我飞了回去，看见父亲很不舒服——住在医院——不是很痛苦，但是显然疑惑自己能否活下来：很明显，他不知道自己得了致命疾病。他去世了，他们告诉我是在睡梦中，希望那是真的。就这样了。我非常喜欢他，今后一切都将不同了（原谅我一直说个没完，但你比几乎任何友人都更了解我们家人亲密无间的关系）——我发现很难调整自己。很奇怪，我想保护父亲——他如此天真，年轻，内心优雅，衣着讲究，不知生死为何物。现在我周围都是律师、会计、公司经理，我出于礼貌去伦敦城，看股票行情表、会计账簿，想着非常无关的事情。[……] 你会在牛津吗？如果你能来看我，我会很感激的。

致以深切的爱

以赛亚

[1]（伊丽莎白）·帕肯汉姆夫人（1906—2002），婚前姓哈曼，1961 年成为朗福德伯爵夫人。

致诺埃尔·安南

1954 年 1 月 13 日［手稿］

寄自全灵学院

亲爱的诺埃尔：

这封信充满了延绵不绝的感激之情，不仅是因为你所做的，而且还因为你所能做的。我想见到你。怎么办？何时？你可以在任何乐意的时候来牛津，这学期我将会也必须得平静地度过，我会欢迎你，无论你何时来。你说吧？任何一天，只要我不在伦敦（在周末几天）。我很痛苦，我深深依恋着父亲，他天真、有朝气、优雅、令人愉快、斯文、温和而完全诚实、内心单纯，我爱他的社交圈，我把他视如兄弟。他没有朋友，也不需要，紧密地与他的小家庭生活在一起，不需要理解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人生，害羞，头脑清醒而又厚道。他不知道有种病叫白血病，没有受太多的苦就去世 421
了，虽然不太舒服，但也对此一无所知。整件事是如此让人伤感，非同寻常：我将永远不会恢复过来，一切都将不同了。它令我身处奇怪而重要的位置，而现在我不太想待在那儿。不过我不会一直跟你说这事的。我时不时得进伦敦城，像皮埃尔·别［祖霍夫］，什么也不懂。但我的情况与他不同，我得不到启示。你对《刺猬》[1] 所做的一切评论对我来说都太精

[1] 安南形容《刺猬与狐狸》是“长久以来以英文写作的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最重要研究”，它的作者具有“超越所有其他思想史学家的天赋，使思想也令人兴奋起来”（“刺猬与狐狸”，第三套节目，1953 年 11 月 17 日；《听众》，1953 年 12

彩了，我将永远在我的祈祷里提到你的名字。不要在意波斯坦[1]与巴洛夫，后者与任何真理或公正相距甚远，用西西里克莫拉组织[2]的行话来说就是：与帮派在一起，反对它。我真心喜欢他。波斯坦是个无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如此，他与18世纪90年代那些曾为拿破仑服务、在王朝复辟中没有受到迫害而幸存下来的人一脉相承，聪明而心怀恶意。如果认为他应用了一些“强硬的”唯物主义标准，幻灭、愤世嫉俗、不再乐观也不再革命，以此作为唯一可以筛分真实的方法，从而使他优于当代混乱的思想与语言，我还是赞成的——可以被“科学”处理的谷粒，从愚蠢的细谷糠中筛选出来。然而进步已经发生，老式的“科学主义”无效，就像在1890年密尔提出的[方法][3]一样。即使后来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主义也比淹没了更早的经验主义的堕落的理想主义更好。他是个聪明而不怀好意的人，欺骗与获胜的欲望有损他的才智品格，像卡尔，像所有强硬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其间发挥作用，但他们所说的既非发自内心，也非发自头脑。你的赞扬在我看来（不过我自己也是个丑陋的偏见持有者）有倾向性：你对我的评价没有错，不论是好是坏，我确实

月3日，第943—944页）。

[1] 迈克尔·莫西·波斯坦（1899—1981），比萨拉比亚裔（当时属于俄罗斯），1938—1965年任剑桥经济史教授。

[2] 伯林似乎混淆了克莫拉（在那不勒斯与坎帕尼亚区）与西西里黑手党，二者很相似。

[3] 钻洞：可推测的恢复。